

人間幾回

黃朴民

解

讀

歷史文化

黃朴民 著

傷事 往



岳麓書社

人間幾回傷事

黃朴民 解讀 历史文化

黃朴民 著

往

事



岳雅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黄朴民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1.8

ISBN 978-7-80761-639-9

I. ①人...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7884 号

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

作 者:黄朴民

责任编辑:彭卫才 吴 茵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80761-639-9/G·1011

定价:20.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文化的魅力

(代序)

自从1990年我的《白话孙子兵法》出版算起,我与岳麓书社的结缘已走过20余年的历史了。期间,岳麓书社还先后出版了我的《白话吴子司马法》、《白话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白话武经七书》、《孙子兵法集注》、《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图文《孙子兵法》、《道德经解说》、《孙子兵法详解》、图文本《老子》,以及我主编的《为往圣继绝学》、《凤鸣集》等等。这是一串长长的书单,更是一份美好友谊的见证。

一个普通作者,一家出版社,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密切而富有成果的合作,是很不容易的。这中间的纽带,我想,就是双方都有着一种对文化的共同敬畏之心。这包括对文化的钦慕,对文化的温情,对传承与弘扬文化的自觉。也许我们做得并不是最好,但是,我们可以有勇气地说: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我们的投入是专注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努力的。对此,我们都问心无愧!

尽管我已经在岳麓书社出过十多部书,但是,我内心深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存着一个小小的遗憾,这就是我的历史文化随笔还没有机会以岳麓书社的名义出版过。而岳麓书社在出版历

史文化随笔方面却是有过光荣的业绩的，一套“历史长河随笔”，是那么的卓越，那么的优雅，曾让我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而其中的《青梅煮酒》《寓言的密码》《尴尬时代》等，更让我高山仰止，悠然神往。我总是期盼着：自己的拙作有朝一日也能忝居其列，共享荣耀。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一个梦想。

如今，我的梦想终于成真，我的遗憾终于弥补。岳麓书社将拙著《人间几回伤往事：黄朴民解读历史文化》列入其出版计划，并以最专业的方式付梓刊行，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分享我本人多年来解读有关历史文化现象的心得。毫无疑问，这是对我的鞭策与激励，我为此而感到莫大的荣幸。

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这种延续，本质上是文化精神的孳乳再生。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当从文化中去探求。换言之，要读懂与理解中国的今天，并展望中国的未来，了解与认识中国的过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要了解与认识中国的过去，关键又在于考察与体认中国的历史文化。它潜移默化、无所不在，影响与规范着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它是厚重的积淀，更是重新出发的基础。

由于阅历、知识、视野以及观念的差异，每个人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会有很大的不同，事实复原可能光怪陆离，价值判断更可能南辕北辙。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读与认知就是准确的，但是，有责任心与使命感的文化人，理应秉持追求真理的立场，尽可能去接近真相，在事实复原上，努力做到“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在价值判断上，努力实现“理性平和”与“温情超越”。不但要以史学工作者的宗旨，再现历史文化的种种表现，更要以思想探索者的原则，思考历史文化的利弊得失。

拙著不可能对整个历史文化的体系与价值作全方位的观察与

评说,而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就某些历史文化的现象作个性化的解读。也许,这些解读在深度上尚比较肤浅,在视野上尚比较狭窄,在判断上尚比较偏颇。但是,可以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态度不乏端正,追求不乏真诚,见解不乏己意。总之,对我而言,这个解读和认知的过程,就是感受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魅力之心路历程,就是认同我们脚下这块热土的历史意识之重铸历程。

希望有更多的人珍惜我们自己悠久的历史,有更多的人垂爱我们自己不朽的文化。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永恒的灵魂皈依!最后,再一次向岳麓书社的朋友们致以我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感谢,因为,是你们帮助我圆了我的梦,还了我的愿!

2011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反弹琵琶：“治世”与“盛世”	001
锥心之痛：君子斗不过小人	008
从终点回到原点：传统政治的轮回	012
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	018
先秦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趋势	028
东与西的较量：上古史嬗递的谜底	043
殊途同归：兵儒互补论	047
孔门造神运动	055
《孙子兵法》的吴文化特征	060
《孙子》智慧可破围堵之局	067
“杂于利害”：兵家的辩证思维	072
韩信《汉中对》战略决策思想	079
国策与国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090
王霸相杂：“独尊儒术”的背后	102
虚幻理想撞上坚硬现实——也说王莽改制	106
歧路彷徨：“党锢之祸”与汉末儒林	114
虚假的完美：《隆中对》的怪圈	124
青史作证：“贞观之治”的特征	129
“卿本佳人 奈何作贼”：君逼将反的故事	136
天荒地老：“五四”精神之我见	145
诗化：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149



当局者迷：困惑的历史	155
期待与超越：历史的“冷”与“热”	163
知识还是价值：“国学”断想	170
小学国学经典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178
史实与艺术：影视史学之我见	182
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	196
传统文化的和谐本质及其价值	204
说“经”“权”	211
血证：中国古代的溺女陋习	215
另类：从一桩古代婚姻纠纷说起	218
不再上当：口号的怪味豆	222
逻辑的纠结：以《管子》名言为例	226
青山遮不住：孙子的魅力	229
人间几回伤往事——韩国战争纪念馆断想	233
伟大的埃及！伟大的穆巴拉克！	241
嚼火漫记（五十五则）	246
燃烧的心——读《顾准文集》	265
乱自内作——读《天朝的崩溃》	271
风雨恸招竹林魂——读《嵇康评传》	275
《泰坦尼克号》的文化密码	279
曾惊秋肃临天下——两部港台片观后感	283
《让子弹飞》起来，让铁门倒下去	293
岁月的碎片：祭禹杂忆	296
种植和谐——对话黄朴民	305
与黄朴民谈史论剑	314



反弹琵琶：“治世”与“盛世”

曾几何时，国人们就被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激动、振奋得有些找不着北了，于是乎，“盛世”的高调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上海某大学一位教授更是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些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隐藏着盛极而衰的因子。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里总是拜托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轻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凌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



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袭细人”）这些方面，并非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大大地超越了“贞观”年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

然而，历史的奇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史为镜，可以识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



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献负刍之言；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徵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古烁今。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其次，是两个时期社会秩序的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



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痛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于是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黷腐败的举措，又确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现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并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再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再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造成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时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羽衣霓裳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锥心之痛：君子斗不过小人

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他的宝座，消弭任何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便于他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朝廷上下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大臣左右洋溢攻讦、倾轧的风尚。而这正是封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

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咀嚼苦难。轻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丧失美誉与令名，退出政治舞台；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但无论出现何种结局，对功臣勋将来说，都意味着不能再发挥他的军事才能，不能再为国家、为民族效诚尽力，不能再对历史的演进嬗递施展任何影响。所以，均是悲剧，皆为不幸。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



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他，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这方面的嗜好，那么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夤缘而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播弄是非，玩弄权术，做祸国殃民的勾当。

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到头来远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养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反过来甚至可以罢你的官，取你的命。

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传统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小人得志者居多、正人君子实干家如意者稀罕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被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赖之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遭杀戮，抱恨终生。

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克齐国城池七十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被燕惠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办法只好逃亡赵国，再也无法施展其军事才能，其彻底平定齐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

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